

您的位置：[首頁](#) ->> [中評社記者專欄](#) ->> [莊恭誠](#)

中評深度專訪：黎麟祥談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

<http://www.CRNTT.com> 20170707



黎麟祥。（中評社 莊恭誠攝）

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記者 莊恭誠）近年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逆全球化”的情緒不斷高漲，英國脫歐、特朗普在美國上台執政，以至瑪琳·勒龐一度接近法國總統寶座，都是相關的顯著例證。

2003年，俗稱CEPA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正式實施。一般認為，這一經貿合作協議無疑為香港經濟走出回歸初期的低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今日，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卻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大爭議話題，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與融合的利益，大部分都流向了商家手中，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卻未見相應的提升，反而還要承受融合過程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人流增多、資源緊張和競爭加大。

主攻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經濟增長與發展（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等領域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黎麟祥，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指出，香港社會對於同內地之間經貿與融合的抗拒，與國際上“逆全球化”的趨勢具有相同的背景，即經貿合作與融合在總體上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相關財富和利益在社會各階層當中的分配並不均衡。

黎麟祥認為，政府應在再培訓失業勞動力、教育思維轉變和教育制度轉型，以及制度性的利潤分享和收入再

分配等方面入手，思考和探討如何應對經貿合作與融合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以下是專訪全文——

中評社：近年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原因何在？

黎麟祥：過去全球化的過程已經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很成功，得到了不少成果。

以中國為例，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開始到今天，一直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參與國際貿易、吸引了許多外來投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亦參與到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當中，其中加工貿易成為幫助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重要踏腳石，令中國形成了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可以說是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趨勢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這種經濟增長令中國數以億計的人口脫離貧困，是人類歷史上很少有的成就。

當然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大部分國家都參與到了全球化當中，由此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南北格局”，“南”指的是發展中國家，“北”指的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很明顯通過全球化得到頗大益處，譬如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益於國際貿易和全球價值鏈，向發達國家出口貨物，賺取利益。發達國家同樣亦得到很大益處，因為它們可以把很多生產的程序、一些勞動力密集的程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此降低生產成本，使這些發達國家的產業更具競爭力。

然而在發達國家當中，這種全球化帶來的益處並不均衡，直接得益、得益較多的往往是大商家、大企業，因為它們受益於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工，而作為勞動者、工人的個人，特別是非熟練的勞動力人口（Unskilled Labour），他們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容易受到衝擊。也就是說，當發達國家的大商家和大企業放棄本國既有的勞動力，轉而尋求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工，以降低成本，這些發達國家勞動力的需求自然就降低，他們的收入會隨之下降，甚至失業，美國、西歐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因此，當全球化帶來的利益未能均衡分配到社會各階層的時候，那些受益較少甚至是利益受損的階層，毫無疑問會對全球化產生質疑和抗拒。以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上台為例，支持他的很多選民都屬於在全球化中受益較少或利益受損的階層，即大城市以外的非熟練勞動力，他們的生活水準在全球化之下，某程度確實是不升反降的。

中評社：如果反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這其實也是一種跨經濟體的貿易合作與融合，尤其是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實行之後，似乎有些香港人覺得，所謂的經濟利益、經濟增長，並未能反映到自己的收入當中，反而有時在內地赴港人士增加的情況下，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你怎樣評價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

黎麟祥：我覺得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互動所帶來的正反效應，與剛才提到的全球化所產生的情況很相似。香港一些非熟練的勞動力，同樣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互動之下受到了影響，以製造業為例，上世紀80年代香港企業把製造業的生產工序搬往內地珠三角地區之後，原本從事製造業的香港工人便宣告失業，除非他們願意返回內地工作，但收入一定比不上原本在香港的水平，因為香港企業把製造業遷往內地，無非是看中內地的廉價勞工，以此降低成本。因此其實在香港企業成功降低成本、受益於內地與香港的經貿互動之時，香港的勞動力受到了直接的衝擊，失去了工作，這也是一種受益不均衡的表現。

除了非熟練勞動力，由於香港在地理上緊貼內地，如今香港一些受過中等甚至大學教育的人士，在收入上亦可能受到兩地往來增多的影響，因為內地不僅有大量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還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學歷上甚至能力上未必比香港本地的大學畢業生差，換言之，香港本地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面臨更大的競爭。

而且除了香港企業可以聘請內地大學畢業生，它們甚至可以直接搬往內地經營，在內地聘請不差於香港本地

大學畢業生的人才，甚至內地人才在普通話方面還更有優勢，有助於香港企業拓展廣闊的內地市場，而用於支付薪水的開支亦可大大降低。這是一種典型的全球化特征，發達經濟體的企業把工序遷往發展中經濟體，在這一過程中甚至無需人員的流動，而是依靠資金的流動。

就目前而言，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往來與互動，給香港經商的人士帶來了較大利益，而且其實對於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也帶來了正面作用，但總體上這種利益的分配在香港社會當中並不均衡，香港的“打工仔”除非是專業人士，即內地不具備的人才或專長，否則在現時的情況下的確比較欠缺競爭力。

中評社：你曾經在一篇報章專欄中談及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方法，其中建議政府負起責任，通過重新訓練失業工人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應對公眾對全球化的不滿情緒。不過如果觀察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的一系列表態，例如他要求美國企業把設在亞洲的工廠搬回美國，你如何評價這種政策？

黎麟祥：這絕對不是合適的應對方式，只會害了他自己的國家。市場本身是具競爭性的，如果要強迫美國企業不向海外遷移，但同時美國企業又要面對國際上其他競爭對手通過向海外遷移來降低成本，那美國企業和相關產業的競爭力自然會下降、變弱，美國的經濟增長亦會放緩。

可能在短期內，美國企業遷移回本國，會暫時令本國某些領域的就業有所改善，但無論是增加的數量，還是可持續性，都是不容樂觀的。

中評社：剛才也提到，企業向海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成本，勢必導致一部分本國勞動力失去工作、影響生計，如何解決？

黎麟祥：根本的解決方法首先在於如何再培訓失業的本國勞動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長遠來說，整體的教育制度本身需要轉型，要訓練學生更具靈活性和創造力，讓學生具備在不同地方、不同行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受教育的人要“學會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而非僅僅接受或被灌輸知識。在今時今日，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應當做好在一生當中轉換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準備，而非像上一代一樣期望單靠一份工作長期生存，這就需要年輕人更加靈活，懂得去學習新事物。

另外就是“利潤分享”（Profit Sharing），這是西方社會現在經常提到的一種應對全球化負面影響的思維。概念上，利潤分享指的是僱主應允許僱員在利潤當中分得更多，例如獎金制度，如果企業賺到錢，僱主就相應拿出一定份額的利潤分給僱員。這些模式目前討論得很多、有很多探索，但實際上如何操作，仍有待更加清晰化。

中評社：就利潤分享而言，其實說的是希望企業家把賺到的錢主動分享出去，但這種希望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實現？畢竟企業家的天性是逐利的。

黎麟祥：的確，在一個奉行市場經濟的民主自由社會當中，或許有人會問，怎麼可以逼迫企業和老闆去做這件事呢？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所以剛才也提到，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去探討和思考。以德國、挪威的納維亞國家（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為例，他們在利潤分享方面做得較多，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例如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都值得去思考和借鑒。

中評社：通過政府以行政力量在其中主導的方式會否較好？

黎麟祥：這是利潤分享的另一方向，即政府通過向企業加稅的方式，改善僱員的福利待遇。

無論如何，在目前的情況下，經濟學家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這方面的問題，探討如何通過不同方式，令經濟增

長所帶來的利益更均衡地在社會當中分配。

中評社：香港特區政府新任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上任前已提出考慮以加稅的方式，應對貧富懸殊和老齡化等社會問題，不過香港商界很快作出反擊，指低稅是香港良好營商環境的保障，表明反對這一建議。你如何看待兩種不同的觀點？

黎麟祥：羅致光所提到的觀念，其實也是利潤分享的一種方式。我認為香港現時要開始循這一方向思考。香港商界認為低稅是其保持競爭力和優勢的關鍵所在，加稅可能會對此產生一些影響，但這種影響未必會很大，關鍵是要尋找一種平衡。

舉例而言，目前香港的標準稅率是15%，很低，如果增加到17%，會否對營商造成很大影響呢？我不覺得這樣的增幅會對企業經營造成很大影響，但是對於僱員和基層市民而言，這一增幅可能帶來很大的利益。假設是這樣的加稅幅度，相信不會令企業喪失在香港營商的誘因，因為香港的良好營商環境不只是稅率因素，法治、接近內地市場等都是相關的正面因素。

在適當加稅的同時，更好地把收益分配給打工仔和基層市民，這是值得認真思考和探討的方向。

中評社：不過香港商界還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目前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以先行使用這些財政儲備，而無需加稅。你怎麼看？

黎麟祥：這只能作為暫時性的措施，而不是長遠可行的方案。現在財政儲備狀況良好，不代表將來會一直夠用。如果從長遠角度來看，這種思維是不可取的。只有將利潤分享制度化，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

中評社：如果說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合作所帶來的財富，未能在香港社會均衡分配，那麼現在是否應當先停一停，先行把收入分配的制度設計好？

黎麟祥：我覺得完全可以做到“兩條腿走路”，兩件事可以一起做，而不應令經濟發展停滯。經濟增長令整塊餅變大，這是一回事；餅變大之後如何更好地切開、分配，則是另一回事。兩件事並不衝突，任何時候都應當同時進行，不應偏廢其中一邊。

[【大 中 小】](#) [【打印】](#)